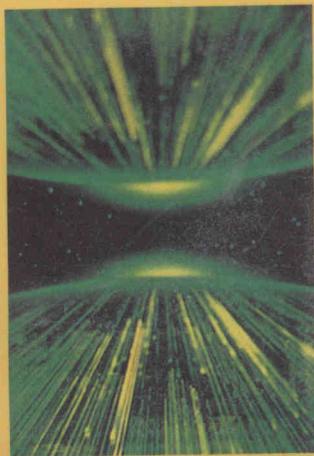


永恒的追寻

报告文学集



鲁正葳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报告文学集

永恒的追寻

鲁正威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我总想追赶生活。几多草树，几多白云，大自然唤起我不可抗拒的写作欲望，象黄河在心中奔腾，从笔下流泻。

尽管我没有文学的天赋，只有一股对事业的热忱。然而，写作，滋养着我内心的生命，点缀着我心灵的沙漠。

我的祖籍是在秦淮河上一个名叫桃叶渡的古渡口，想当年恐怕也似锦繁华，但它仿佛离我很遥远。我真正的故乡是在大夏河畔的古河州。年幼的时候对未来充满梦想，唯独那个整天伏案、呕心沥血的我却从来没有出现在梦中。

往事如烟，蹉跎岁月。一个幼弱单纯的少女，忠于“干一行爱一行”的口号，在国家多难的年月，还曾赶牛犁地，修理汽车。

从15岁当上穿一身灰布制服的供给制干部，加入土改工作团的队伍中，直到55岁终究成为一个远离官场的“闲人”，无边的世界，任命运的安排。

不料，在我43岁的人生渡口，踏上的却是文学这条船。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中国文艺复兴，一个引流我思想涌动的契机悄悄来临，我开始发表报告文学。不宁静的记者生涯，十年行色匆匆，经历风霜雨雪，采访了多少知名人物，写过多少芸芸众生。他们如同西部壮阔的原野般的胸怀和高山般的意志感染着我，驱动着我。而我常常为我这支笨拙的笔无法把现实的美与丑显示给读者和自己而悲哀。

作家的责任是在改革洪流的背后寻找和讴歌一种无形的支撑

我们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我喜欢我所记录的这些为开发大西北而历经坎坷，饱含自信和艰辛与命运抗争的坚强灵魂。我的这些作品是从他们的欢乐与哀愁中滋生的花朵。有人说，文章是案头的山水，尽管我的作品很少奇峰峻岭，然而，一片青玉，几束花光，依然能反照出西部灿烂的春意。

对生命的探索，对命运的疑问，这是一切作家永恒的主题。创作的小路荆棘丛生，但对于我，那永远意味着神奇的远方。

我欣赏一位当代中国文学泰斗的话：作家不是官，但并不比官低一等。

黄河上飘洒着金色的十月，它叫我鼓起勇气，把这本书献给我的朋友，献给为振兴中华默默奉献的人们。

我从未奢望什么，我所要做的就是寻找短暂而富有风险的生命意义。

目 录

前言

▲上 篇

两个待业青年的加拿大之行·····	(1)
井上靖与西域·····	(11)
壮歌慷慨五十秋·····	(24)
待到山花红·····	(48)
银光·····	(55)
拥抱黎明的思考·····	(73)
纺出来的史诗·····	(85)
环江河谷的火炬·····	(99)
阿尔泰紫苑·····	(107)
绵绵汽车梦·····	(114)
夕阳山外山·····	(129)
草色青青·····	(136)

郭宪章传奇·····	(150)
但愿书香满人间·····	(156)
“东南风”席卷兰州城·····	(168)
在那茫茫的冰原上·····	(177)
中部的那片土地·····	(192)
心，盘旋在巴丹吉林·····	(198)
从高原走向大海·····	(210)
北山，有一个“神仙”·····	(223)
在“死亡的土地”上战斗·····	(230)
招聘厂长面临的挑战·····	(237)
土坎上的村庄·····	(245)
在通往明星的路上·····	(263)
远方有涛声·····	(273)
高原花光·····	(289)
丹心果·····	(297)
光照菜畦·····	(305)
二度花开·····	(316)
兰州畅想曲·····	(328)
“东有温州，西有河州”·····	(336)

▲下 篇

常青的事业·····	(355)
黄河上游的新曙光·····	(358)
李桂笑谈走西口·····	(360)
探求白色荒漠的奥秘·····	(363)
追求，为了生命之春·····	(366)
访王崇伦·····	(369)
省府大楼与绿色田野·····	(371)
黄河上，那飘拂的彩练·····	(377)

兰州地毯在国外.....	(380)
“花城”使者话友情.....	(382)

后记

上 篇

两个待业青年的 加拿大之行

1984年11月1日。我们终于踏上了北美大陆。

同机到达的旅客差不多走光了，剩下我戴忠基，弟弟戴忠础。来这里的目的是参加第六届国际新制做的提琴及琴弓比赛。

不知道谁会来接我们。我们是甘肃兰州的待业青年，好不容易拿着自己制造的提琴到这里参加比赛。

中国银行的汇款说是四天到，结果十八天过去了也没见影子。原来想在香港买身衣服，可这么一来，没办法，只好把身上穿的工作服扔了，匆匆踏上国太公司的航班。穿着姐姐给织的高领毛衣，价值十一元人民币的化纤裤子。

没有翻译，我们的英语又讲得不好。难怪一位加拿大人说：“还好，你们没上错飞机，已有一位中国学生错乘到马来西亚去了。”机场工作人员看了我们的护照，想帮助我们，但又听不懂我们的话。他从电话簿上找到了一家华人餐馆四川酒家。“喂！请问有什么事？”话筒里传来亲切熟悉的华语。

“想找中国大使馆。”我激动地告诉她。

这时，我们想到了祖国，想到了家乡，想到了……

坎坷岁月中的音乐梦

我们从小就喜欢做音乐的梦，对小提琴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席卷全国的那场大风暴刮来了，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地方。

“读书无用”，停课闹革命。于是，我们就待在家里拉拉琴，练练字。音乐像一座巨大的避风港，这里有我们的欢乐，我们的希望。

不久，爸爸被打成了反革命，关进了“牛棚”，又进了班房。借来的琴被要走了。那是什么年月？谁敢和反革命家属沾边？买一把吧，钱从哪里来？爸爸一抓，工资没了。妈妈到候铁社当临时工，干得怎么卖力，钱总是拿得最少。谁叫她是反革命的老婆？每月二十多块钱，要养活一家七口。好心的街道干部偷偷地从五保户补助费中挤出十元给我们。妈妈到各家粮本上借包谷面，配给的肉票都作废了。多想吃点肉啊！

清贫的日子倒也没什么。可是，有一天，我们住的街上发现了“反标”，于是人们首先注意到我们，被当作反革命嫌疑犯关在小屋里隔离审查。有人断定是我们兄弟俩干的，为此还找出了我们的毛笔和字帖。经过这一番惊吓，还练什么字？拉琴吧，哪有琴啊？

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我们下了自己造琴的决心。

制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老师，没有资料，没有材料

……全家为此四处奔忙，借到几样简陋工具，在一个朋友处发现了一本《小提琴、大提琴的制做与修理》。一位同学的父亲，家里并不富裕，好不容易攒下木料做家具。他把水曲柳给了我们：

“大立柜算个啥！我等着看你们做的琴。”

我们把床、饭桌当工作台、炉子、菜刀也成了不可缺少的工具，没有弯测仪和模具，就用合金铝管在火炉上烘烤。我们一点一点地硬是要把琴抠出来。

困难，失败，不知遇到了多少。有时真想算了，不干了。可是一想到寄望于我们的那些人，看见桌上那本珍贵的书，总觉得斯特拉迪瓦尼，那意大利不朽的制琴大师正对我们慈祥而信任地微笑。

我们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走出家门，站在伏龙坪上，这个似乎与某一个神奇故事关联着而实际上是一个贫乏的小山包，瞭望从天上流下来的舒缓的黄河，迎接雄伟的日出。透过满天朝霞，仿佛看到帕格尼尼，这个在赌棍与小提琴之间选择了后者的热那亚人，正在演奏我们制造的琴。

我们制作的第一把小提琴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好象是古希腊某个哲人说的。

1977年的春天，我们的第一把小提琴出生了。没有等到粘贴上去的指板和弦枕干透，我们就急不可耐地拉了起来。那荡魂夺魄的音符，从琴弦上一个个快乐地跳出来。成功了！我们什么也不想，只想哭。拉呀拉呀，拉到很晚很晚，那情形永远也忘不了。

我们的琴制造出来了。“文革”作为中国深重的一页历史被翻了过去。爸爸平反了，家境开始好转。

1979年的初夏，我们怀着兴奋不安的心情查阅着各大学的招

生简章，只有上海音乐学院有小提琴制做专业。

5月13日早六时，我们跨上了东去上海的五十四次列车。没想到第一次出门就奔向上海，这座只是电影上见过的极富有魅力的全国最大的都市。

54次列车恐怕是全国数得着的拥挤车次，在这横穿中国腹地的旅行中，我们一直站着。到达上海是十六日晚十点，也就是接到简章后的第四天。我们是在候车室过的夜。

做梦也没想到，校方已初试发榜了。

我们要求报名应考。从两排紧闭的牙齿间硬棒棒进出两个字，“不行！”托别人去通融，也不行。全国四十名考生，只有十人参加复试。我们却连初试的资格都没有。想法子请了一位监考人到学生宿舍里看了我们制做的琴。这位据说是音乐学院附设提琴制作厂的技术指导，他惋惜地说：“这琴怕是全国应考琴中最好的。可惜啊！”

为什么招生简章发得那么迟？我们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后来听说只有两个名额，早走了后门，几十名考生只是做了“分母”。告他们！有什么用？两个待业青年的状子，只能是石沉大海。

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们。“和专业大学生的作品比个高低！”就在我家那低矮简陋的小屋里，一把把小提琴摆在了面前。1982年广交会上，天津的，河南的，还有东北的人，围着我们：“是谁指导的？搞了几年制做？”“没有名师指导？不可能！”

那是1981年冬天，我们去了北京。为自己的琴做鉴定。气温骤降，我们没带棉衣，在北京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怀抱三把自己制造的琴坐在地上，背靠背地取暖。

长途硬座旅行的劳顿使瞌睡虫不断地袭来。“可不能睡着！琴，琴，琴。”梦里还这么想着。到京第三天，才托人找到一个住处——一家工厂汽车班的白天休息室。

终于见到了中国舞台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王湘教授。老教授显然激动了，对我们说：“我搞了一辈子研究工作，建国三十年来，没见过象你们哥俩这样自费跑到北京来鉴定琴的。”他眼里似乎闪着泪光。我们回答着他的问话，谈着自己的见解和设想，面对这位温和慈祥的老人，就像是朝夕相处的亲人。

第二天，王湘教授和北京乐器研究所工程师吴俊杰，通过鉴定，以中国舞台科技研究所的名义为我们出了一份鉴定书：“从新琴角度来衡量，已经达到了高级小提琴的程度。经过自学努力，已掌握到优良小提琴发音的基本理论及制做方法，在没有名师指导的困难条件下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是可贵的，应给予支持和鼓励。”他们还给我们讲了声学及提琴理论，赠送了资料，而且叮嘱：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不要丢了研究制作，这是一门深奥的科学，当今世界上有多少人为之奋斗。

传说在亘古时候，没有太阳和月亮，在一大片森林里，人们摸索着，终于有一个人，剖开自己的胸膛，用那颗燃烧的心，给大家温暖和光明。

无论将来成功或者失败，我们忘不了那些给过我们温暖，在困难的时候拉过我们一把的人，那一颗颗燃烧的心。

难忘的1982年10月11日。我们两个陌生的小人物居然坐在北京中关村五号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里，由中国声学学会召开的对美国小提琴声学博士CM哈琴斯夫人及乐器用木材物理学家M哈琴斯教授的欢迎会上。当哈琴斯两小时的学术报告刚结束，作为大会主持者——我国著名声学家王湘向坐在最后一排的我们热情招呼：“到前边来。”

“这是中国业余小提琴制作者戴忠基、戴忠础兄弟俩，特意从甘肃省专程来北京听课的。”王湘把我们介绍给哈琴斯。哈琴斯夫人高兴地说：“非常感谢。”

哈琴斯夫人是蜚声国际的小提琴声学博士、材料学专家、演

奏兼制作家，对历史上的名琴和制作中的数以千计的琴板进行过共振实验。她带上眼镜，仔细地看了我们的琴，试拉了一会儿，翘起拇指笑着说：“很好！”这便是她的主观鉴定。

经这位热心的美国老太太的介绍，我们成了美国小提琴协会的会员。不久，接到了参加第六届国际新制作的提琴及琴弓比赛的邀请书。

“飞天”琴飞向世界

我们是甘肃人，我们把自己制的提琴取名“飞天牌”。

我们虽然是平民百姓、待业青年，但一定要去渥太华参赛，那怕债台高筑。哈琴斯夫人曾经说过：“要想得到国际上公正的承认，就得参加国际比赛。”我们慢慢取出了琴，《命运交响乐》的奋斗、探索、追求从琴中流出。

为了参赛，1984年我们曾把许多宝贵的时间花费在东奔西跑的路上。5月，省文化厅召集兰州有关专业人员为我们的琴作了技术鉴定。6月，省有关部门专门开会研究我们出国参赛的事。侯宗宾副省长指示：政府要支持兄弟俩的创造。这样的人才不能埋没。对办理出国手续和经费以及今后的发展等作了具体安排，形成了文件。兰州市长批示给我们解决住房困难，省经委与我们商量办厂问题。

眼看赛期逼近，可是护照谁来办？路费谁给？具体事情办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里办护照。“先生，职业一栏怎么没填？”“没有职业”。“哦，明白了，你们就是中国所谓的个体户。”那位风趣的加拿大人，用带着洋味的中国话笑着说。

一辆漂亮的福特小轿车停了下来，一位姓陈的副武官到机场接我们。

我们住进了一家饭店。“先在这儿住一夜。”他代付了六十加元住宿费。

“胆子真大，不懂外语，不带翻译，身上没一文美元，你们就闯到渥太华来了。”到了大使馆，使馆工作人员七嘴八舌，显得很恼火。“瞧你们穿的这个样。甘肃也太不像话，就这么让你们出来？”我们真是有苦难言。

“请先借给我们一些钱。”

“大使回国去了，钱不好借。”

“那就先借两双皮鞋，两套衣服穿穿。”

“哪有合体的？你们甘肃连套衣服都做不起？”

使馆终于给我们借了五百加元，领我们到街上各花二百元买了套石磨蓝的西服。

过了几天，汇款总算到了。

比赛在渥太华沙特劳瑞尔宾馆开始了。时间是11月4日下午。16个国家的近二百把参赛琴被编号送进了赛场，我们也住进了统一包租的高级宾馆。裁判由三位制琴界有名的大师担任。

评比结果怎样？谁能得金牌？大家猜测着，一个个心神不安。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却只有宾馆门口的服务员总是报以亲切的微笑。他穿着漂亮的燕尾服，别着考究的领花，称我们“戴氏兄弟。”这使我想起，在国内人们都称我们戴氏兄弟，有的对我（忠基）的两撇小胡子感兴趣，有的说我弟弟（忠础）长得比我魁伟，象是我的保镖。

11月9日，盛大的午宴之后，当场公布了前八名。美国人得了金牌。我们中国参赛的上海、广东，没有一把获奖。

关于我们，新华社渥太华电：“从甘肃兰州来的兄弟俩戴忠基、戴忠础，在国内属待业青年，所谓待业在国外是失业者。他们虽然没有拿到奖，但音响效果得到专家好评。”我们的两把琴在78个名次中为49名、66名。专家对我们的琴评价不错，提琴琴

漆得分几乎是最高的。这对甘肃这样一个没有专业厂的省份来说，很不容易。不过，终究离我们的愿望差一些。如果我们对国际行情不那么闭塞，兴许会更好一些。

我们的对手“武装到牙齿”，我们自己呢，参赛应注意什么？谁告诉过我们？琴没有说明书，没有广告，是自己油印的纸商标，上面连个设计图案也没有。不是不想做好些，在兰州市里跑了几家，商标设计套色得300—500元，彩印的话要一千多元。这么贵，哪找钱去？人家都是价值50—100美元的琴弦，我们用的是一点八元的上海产弦，人家的配件是国外木材做的雕花进口的，我们是从北京买的便宜的处理品。自制的琴盒刚到加拿大，廉价的蓝色涤棉衬布已经破得露出了木头，重新做吧，来不及了；买吧，钱没有汇到。

我们忍受了一阵难言的痛苦之后，想开了。

我们没带翻译，错过了参赛提琴展出时的订货机会，赛后还得进行一些马拉松式的讨价还价。这时候我们已经花五十美元换上了一套羊肠弦。

有些人认为我们的琴质量不错，可不是名牌，不买。多伦多一位有名的提琴制做家断言琴是法国人做的，我们可能是买来改装了一下。加拿大伦敦音乐大学的几个音乐教授拉完琴后，一口咬定制琴的材料是加拿大的，中国没有这种材料。真有意思。就这样洽谈了几次，价格却上不去，我们急于卖琴是不可能了。

在加的中国学者、留学生联谊会的同志为我们出主意，让我们在销路未打开前先降降价。留加的湖南冶金学院的尹志明讲师放弃赴宴给我们义务翻译。天津南开大学吴老师、王老师等体谅我们经费困难，为我们解决住处，减收房租。音乐界的一些华侨主动为我们奔忙。

我们仍旧在为飞天琴寻找市场，有一些演奏家愿出上万元加元买我们的参赛琴，那怎么舍得。上海、广东的参赛者高高兴兴访

幽觅胜，观光市容，我们却在唐人街吃最便宜的饭，外出时能步行的不乘车，能乘汽车的不乘火车，还到别人家寄宿。好奇的外国人发问：“你们中国参加国际赛不都是国家掏钱吗？你们怎么自己拿钱？”

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们应邀去多伦多一所音乐学院讲课。不同肤色的音乐系学生和他们的教授轮流演奏了我们的飞天琴。

“今天，请从中国兰州来的戴氏兄弟为我们讲课。”音乐学院的教授讲完课，几乎拉着我们上了讲台。

“兰州在哪？”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勾画出一个鸡的轮廓，在中间点上标记，这就是兰州，它是中国的地理中心，甘肃省的省会。紧接着，他们纷纷举手提问：“你们对提琴是怎么发生兴趣的？琴是怎么做出来的？你们兄弟之间专利各有多少？”“国内好，还是国外好？加拿大木材怎么样？”……问题接踵而来。

讲课出了一身大汗，不光是紧张，而是待业青年的我们真正认识到了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感到了中国的伟大，这种感情在异国他乡更加强烈。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都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用一位华人的话说：“中国的国际地位每提高一步，国外华人的地位也随着提高一步。”

1986年·兰州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两年过去了。

美国小提琴协会主席汉斯·陶西格的信摆在了我们面前。这次国际比赛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举行。我们在地图上找到了这个城市，属于美国的“阳光地带”，隔着太平洋，遥对我国的上海。

两年前，从加拿大出来，我们又去了美国，只给家里人去了一个长途电话。弄出许多关于我们的传说：“叛逃了！不回来了！”叫人啼笑皆非。而母亲为此担惊好多天，她梦见我们象“伊佐拉”一样被人绑在树上……

母亲很坚强，在父亲入狱的日子里独立支撑着这个家。我们多少次停了下来，又干了下去，就是因为母亲的支持。她没有埋怨我们，没有母亲也就没有我们的琴了。

回想在国外的日子，虽说没有获奖，但感触很深，特别是开阔眼界，明白了许多事情。

我们从小就爱做梦，到了接近而立之年的岁数，仍旧生出了一个梦，那就是，作为中国人，有朝一日，让斯特拉迪瓦尼，这位因为留下540把提琴至今无人超过而安眠在地下已两个半世纪的制琴大师，再也躺不住，躁动起来。